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1.013

我国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的研究评析^①

于江涛

(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300222)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对这一制度的内涵与定位、历史评价、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关联等焦点问题,存在很多争议。总结和评析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观点评析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1-0065-04

Review of Researches about China's Basic Socialist System in the 1950s

YU Jiang-tao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stablished in 1949,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made thorough researches on China's socialist basic system in the 1950s. But there have been many disputes on some focus issues, such as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orientation, historical evaluation, comparison with the Soviet Socialist system,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ist basic system established in the 1950s and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of importantly academic value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above academic issue.

Key words: in the 1950s; the basic system of socialism; viewpoint analysis

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雏形,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5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政要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持续性关注、研究,形成了丰厚的学术积累。在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下,梳理、总结和评析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1 关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涵与定位

学界主要有3种观点:一是认为20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属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高放借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的“现代社会主义”概念,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向“现代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我国5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都属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1]。陈文通也支持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经历了具有质的区别的两个阶段:分别是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社会主义阶段和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型社会主义阶段^[2]。一

① 收稿日期:2014-04-20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KS13-0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14JJD710013)

作者简介:于江涛(1979-),男,河北保定人,讲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些学者据此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向“现代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突破和超越^[3]。

另一种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我国国家权力结构安排及其运行体制出发,得出“党国体制”的结论。“党国体制”即“党治国家”体制,也有学者称“全能主义”制度。陈明明认为这种制度是20世纪不发达国家共产主义革命的产物,它既是20世纪中国克服组织资源匮乏以建设现代国家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人们观察和理解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有价值的解释性概念^{[4]198}。林尚立从“人民革命—政党建国—党国体制—现代国家”的中国政治发展逻辑出发,认为这种制度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必然,对民主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不是民主体制的反动^{[5]20-26}。杨光斌认为这种制度是革命战争年代“党军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转化,主张用“政党中心主义”而不是在社会科学中流行的“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来考察中国制度变迁和现代化经验^[6]。

第三种观点从政党与国家、社会和公民关系入手,认为是一种极权主义制度。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把社会主义政权归类到极权主义制度之列,对西方社会影响很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政要一般对社会主义政权和共产党抱有极大的意识形态偏见,比如,J·弗里德里克在《集权主义独裁与独裁权力》一书中就认为中国是一个政治体系对社会全面渗透的社会,类似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一种极权主义制度。这种观点反映了西方社会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中国认识的狭隘和偏见,他们不愿或者无法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制度现实,而对中国制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几个“点”上,即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集权政治、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等。这种观点需要国内学者进行必要回应和批判。

2 对20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评价

评价20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立足于20世纪50年代这一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历史条件,用发展的观点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其特点、优势及其存在的不足。学者一般从“中国特色”和“民族性”的角度论述其特点,并习惯于把50年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点与优势结合起来,认为其特点决定了制度优势的发挥,或者认为其特点也是制度优势的体现。比如,一些学者认为当时我国政治制度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提法上不同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基础更加广泛,带有统一战线的特征;我国的政党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一个创造,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势^{[7]194-195}。这种把制度特点和优势结合起来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从学理角度看,特点与优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界限应予厘清^[8]。而且,一个国家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应立足于整个人类社会不同制度形态的更替,尤其要立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和缺陷,而不仅仅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形态下的两种具体制度表现形式上进行比较。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层面有着鲜明的优势,但在具体制度,尤其是政治经济体制等方面存在明显弊端:一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把商品和市场排除到社会主义制度之外,社会生产效率低;二是分配原则有平均主义特征,缺乏动力机制;三是民主和法律机制欠缺,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方面的民主制度化,导致官僚主义等弊端^{[9]664-671}。一些经济学学者认为当时对所有制问题存在狭隘的理解,只把它单纯理解为生产资料的归属,并静止地看待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是把它看成一个发展过程^{[10]149},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时就存在一些问题。一些政治学学者从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执政党通过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和国家意识形态全方位影响社会,社会机构和个人成为“国家政治机器的部件”,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4]248}。

在评价一种制度模式的时候,也不可忽视隐藏在制度形式之内的价值因素,尤其是制度的价值取向。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即使在一定时间内产生诸多“不适应”特征,但如果它的价值取向是一种更高级的价值形态,那它终究会在实践中彰显其制度优势^[11]。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取向,主张从价值取向的角度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12]。认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对社会主义的价值建设有所忽略,以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其价值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制度价值是制度内部更深刻的内涵,不应该为了固守某种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而忽视制度的价值追求^[13],这对我们更深入地研究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重要启示。

3 对20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对20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学界共识,邓小平也多次表达这种观点。但两者是否可以归到同一类制度形式中去,学界有不同认识。一种观点是“基本相同说”,认为两者都属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复制和移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中国在建国后“不动脑筋地模仿”苏联,无论在经济领域、意识形态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与苏联基本相同^{[14][17]}。国内也有学者持类似观点。冯颜利认为中国在50年代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而是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极为相似,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也包含了只适用于苏联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15]。

第二种观点是“部分相同说”。学者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内容上对中国与苏联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苏联基本一样,但在政治制度上与苏联有着重大差别。赵耀认为,我国20世纪50年代在经济制度方面较多的是学习苏联,如纯粹公有制、单一的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而政治方面更多的是自己的创造,如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16]。黄宗良也认为,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体制和文化建设上有着明显的照搬苏联表征,但在基本政治制度建设上却有着自己的独特创新,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17]。

第三种观点是“结合说”,认为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学习和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但在任何一个领域又不是完全地照搬照抄,而是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实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经验的结合。肖贵清从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1954年宪法等4个方面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比较,得出这一结论^{[18]258-265}。这种认识较为客观地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关联,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首先立足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和具体实际,即使受某个国家制度形式影响较大,也不可能与该国制度完全相同,也不应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割裂为两部分而认为一部分相同另一部分不同。

4 关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关联

学界主要有“对立说”和“统一说”两种观点。“对立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制度模式或制度内容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对立性,否认二者之间存在的历史继承与发展关系。“对立说”主要有3种说法:

一是把两者定性为两种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对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对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的部分否定,是“一个主义,两种模式”。高放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进步,认为两者虽然“都属于社会主义,实则有局部质的区别”^[1]。二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具体内容上是对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甚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观点主要存在于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美国学者乔纳森·安德森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也很明显,接近于里根和撒切尔主义的模式^{[19]237-238}。美国左翼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新型的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20]。三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复归”和回到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前。杨家志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经济制度的复归^[21]。杜导正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导致党对新民主主义探索的失败,而改革开放后则是新民主主义回归和发展^[22],其隐含意思就是说我国不应该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结束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和新民主主义的制度。

“统一说”主张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置于新中国60多年发展历史中考量,二者在具体的制度形式和内容上虽然存在差别,但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历程看是统一的,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积极肯定了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地位,认为它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肖贵清在谈到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时分析

了两者的历史关联,认为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制度构想和设计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雏形^[23]。李伟认为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确立的国体和政体,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建立和发展的政治制度体系的根本内容和核心原则,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制定具体制度的母本和依据^[24]。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对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改革、发展与创新。龚育之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纠正、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其中“继承和发展”是“基本的方面”^[25]¹⁰,这种观点也包含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关联的分析。郑云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新民主主义制度、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联系起来,认为3者之间是有机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可以概括为曲折的“螺旋上升”过程^[8]。侯远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分为3个历史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酝酿准备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党的十七大是探索发展阶段,从党的十七大到党的十八大是形成确立阶段^[26]。这种分析突出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探索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历史关系,从整体上把握20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 [1] 高放. 从传统社会主义到现代社会主义[J]. 马克思主义研究, 1989(3): 10-19.
- [2] 陈文通. 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认识[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8(1): 4-14.
- [3] 朱继东. 邓小平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依据、层面及时代意义[J]. 理论探索, 2012(3): 33-36.
- [4] 陈明明. 党治国家的理由、形态与限度——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讨论[C]//复旦政治学评论.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5] 林尚立.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 [6] 杨光斌. 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2): 1-6.
- [7] 曲庆彪. 超越乌托邦——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6.
- [8] 郑云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评析[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1(6): 98-103.
- [9] 唐宝林.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7.
- [10] 言人昌.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C]//《经济研究》编辑部. 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4)(上).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
- [11] 骆郁廷.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自信[J]. 江淮论坛, 2013(4): 81-87.
- [12] 范雁存. 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取向[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 19-23.
- [13] 王玫姣. 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与价值取向的关系[J].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 85-88.
- [14] 麦克法夸尔, 费孝通.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15] 冯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比较[J]. 江汉论坛, 2007(11): 5-10.
- [16] 赵耀. 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N]. 人民日报, 2012-10-12.
- [17] 黄宗良. 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 中共党史研究, 2010(7): 36-41.
- [18] 肖贵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本问题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19] 乔纳森·安德森. 走出神话: 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
- [20] 刘爱武. 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质疑与坚定道路自信[J]. 山东社会科学, 2013(3): 20-26.
- [21] 杨家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的复归[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1994(5): 1-7.
- [22] 杜导正. 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J]. 炎黄春秋, 2009(4): 6-12.
- [23] 肖贵清.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3(11): 37-43.
- [24] 李伟. 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J]. 政治学研究, 2008(3): 7-11.
- [25] 龚育之.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增订新版)[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 [26] 侯远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确立的历史考察[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3(1): 27-33.

(责任校对 游星雅)